

怀故人

人生的剪辑版

小非

我这个人不爱总盯着微信，甚至连提示音也未设置。各色人等，不停地在朋友圈发着大同小异的消息，许多还是胡编乱造的，哪如静下心来捧读一本好书过瘾。

然而信息时代，离开了手机还真是不行，每日午饭后和晚饭后，还是要浏览一番。遇到心中尊敬之人发的图文，也会驻足停留，他们的认知高度，省却了我不少筛选的麻烦。

还有一些信息是躲不掉的，哪怕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瞄了一眼，它也会迅速跳出来。2023年冬日，二马路美文书店冷宝良去世，我就是在朋友圈中看到他女儿用父亲手机发出的讣告。不到两年，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日，我的学生王大庆离去的消息，亦是缘此得知。

大庆走得太突然，闻听后非常意外，心中甚至出现了痉挛般的疼痛。年近古稀，生老病死看得多了，本不应如

此激动，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“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”，生老病死乃人生常态。倒不是漠然，亲人以外，不熟悉或没有交集的人故去，由于不了解他们的情况，最多叹息一声而已。不过熟稔的朋友走了，还是难免感伤，大庆毕竟太年轻了！

我当班主任那拨学生，乃劳动技校铸造专业八四级的，大多1968和1969年出生，小我一轮左右。1985年春天，前任班主任调到市直机关工作，教务处找人顶班，不知怎么就把我这个他们心目中有些吊儿郎当的人派上阵去。然而干了不足一年，我又被借调到省劳动局写材料去了。

说是他们的老师，其实徒有虚名。我虽是个挺会讲课的语文老师，却没给他们上过课。技校语文属公共课，只有一个学年，我去的时候还剩下不到一个学期，教务处就没有换我讲课。后来我倒是经常在酒桌上与他们谈天说地，神

聊海侃。我的辈分摆在那里，退休后也没有宣泄的场合，每次凑到一起喝酒，他们都耐着性子听我讲，愿听不愿听，面子总得给足，算是补课吧！

王大庆是副班长，国字脸，长得白净，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子。铸造专业一水儿男生，十六七岁的年纪，上天入地，没有不敢干的。他们调皮捣蛋的事儿，我曾在《我当班主任》中有过详细描述，那篇文章刊载于2023年11月1日的《烟台晚报》上，有些意思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大庆上学时和我走得近，有些同学说他巴结老师，其实哪有那样的事儿，是我想抓住几个骨干掌握点情况。要不然他们那个“作”法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捅出个天大的窟窿来。后来喝酒时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同学们安插到我身边来的？在场的学生齐声回答，老师你现在才知道？说罢都哈哈大笑，又是一阵狂饮。

莱州去世，吊唁活动就是他组织的。去年汤伟同学因脑出血，只是其平日与大家几无联系，消息是后来传出来的，大庆又唏嘘了一番。如今班上三十六位同学，加上他已缺失了十二分之一。

同学们平日联络，主要是通过聚会。每年的几个大节或是长假，凑一凑是少不了的。确定时间、联系酒店、落实人数、结算费用等琐碎之事，都是大庆来操办。我曾打趣道，你的名字命中注定就是要搞这些喜庆之事。

我不乏名为“大庆”的朋友，1959年出生那拨缘于新中国十年大庆，1963年出生那拨因为是年国家“工业学大庆”的号召。我问他的名字，他说自己是1968年出生的，母亲的分娩期预估为国庆节，父亲琢磨着孩子的名字要与节日有点关联，孰料却晚了一天。那时国庆节有“五年一小庆，十年一大庆”之说，既不逢五又不逢十，取名“大庆”本来就有些勉强，而且生日也不在“十一”，只得用小名先糊弄着。没想到半年后党的九大召开，借着如此大事，叫“大庆”就堂而皇之了。

席间大家挺沉默，毕竟心情不好，每人举杯说几句时，都是先敬大庆一杯。大庆海量，也喜欢喝酒，端起杯来很豪爽。他的经济条件不宽裕，平日也没有多少好酒，那些年假酒恐怕也喝了不少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又涌出一阵酸楚。

就在大庆去世前十天，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英年早逝，许多人深感悲痛，网上的悼念文章铺天盖地。大庆也是差不多的年纪，只是他是个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，难享此等哀荣。但是作为曾经的班主任，我还是想留下点文字，为这位平凡的学生说几句话。

人生苦短，大庆在这个世上的足迹只划过了五十七个春秋，他的生平只有短暂的剪辑版，后半段没能续上，有些遗憾。不过亦如有些人说的那样，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。这样想，也就释然了。离别总是令人心痛的，但是人生永远也离不开的就是离别。

乡村记忆

嘎斯灯

王德润

嘎斯灯，承载着我年少时的深深记忆，绽放着美丽的光环。

最早看见嘎斯灯，是20世纪70年代在农村的露天电影场地。

那时，电影放映队一般一个多月能来村里放一场电影。每当传来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，大家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。天没擦黑，大人就早早收工，孩子放学后，赶紧吃口干粮，拿着椅子、板凳、马扎等坐具摆放在放映现场，以便看电影时能有个好位置。村里放电影的地方在村小学南的操场上，电影还没开场，总能看见闪亮的嘎斯灯，那蓝色的火焰于风中欢快跳跃着，在黑暗的夜里格外显眼。在嘎斯灯旁有一个小摊位，不时传来“卖种来，刚炒的又香又脆的种”的响亮声音。卖种的是和我们家一个生产小队的大娘，当年她50多岁，她说的“种”其实是炒熟的葵花籽。我非常好奇地上前观看这嘎斯灯，它既明亮，又不怕风。我心里美美地想，自己家中如有一盏这样的灯该多好。循着大娘的声音和明亮的灯光，有不少村民陆陆续续前来买葵花籽，于是，嗑葵花籽的声音和香气在露天电影的场地上弥漫。当年，一天10个工分的劳动收入仅在1元左右，且在年底才能开支，平日能花一两角钱买葵花籽也算是“高消费”了。在放电影之前一般先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《新闻简报》，既有当时全国的新闻、农业先进典型，也有湖南长沙马王堆墓、中山王刘胜墓考古发现等题材。电影题材也比较丰富，有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等现代京剧，有《党的女儿》《闪闪的红星》等红色经典电影，有《黑三角》《秘密图纸》等侦破电影，有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，也有《我们村的年轻人》《月亮湾的笑声》等农村题材电影。放侦破电影时，卖葵花籽的大娘经常问周围的人电影里哪个是好人、哪个是坏人。在嘎斯灯的映照下，大家边嗑葵花籽边小声交谈，沉浸在紧张精彩的电影情节中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嘎斯灯又称电石灯、乙炔灯等，是19世纪末德国发明制造的一种通过燃烧乙炔气体发光的灯具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，嘎斯灯曾作为我国城市煤气灯的替代品，广泛应用于街巷照明和家庭照明。

而今，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，嘎斯灯早已被白炽灯、荧光灯、LED灯等光源所取代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在我的记忆深处，那盏嘎斯灯犹如一颗明亮的星星，始终闪耀着迷人的光芒。

1987年夏日这拨学生毕业后，散布得“天南海北”，不过都在烟台各县市区范围。那年学校实行有偿培养，企业若想要毕业生，就得掏3000元委培费，所以他们经常调侃，说自己是被学校卖出去的。虽说得花钱，企业还是很欢迎。劳动技校教学质量首屈一指，每次全国技工学校统考都名列前茅。关键就在于学校的附属工厂办得红火，实习教学不能纸上谈兵，得有场所和设备，理论课和实习课两周轮换一次，学生掌握书本知识后再下车间操作，如虎添翼，分配到哪里都能立马顶得起来。

他们毕业后接着赶上了市场经济大潮，许多学生三两年后就放弃了原来的专业转了行，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，勇猛搏击，很多人的事业风生水起。譬如孙洪军就曾在朝阳街开过酒吧，股票也玩得不错，不过同学之间的差距也很快拉开了。

那些年班长赵军去了澳大利亚打工，大庆责无旁贷顶起了联络同学的角色。他属于守成那类人，分到烟台机床附件厂后三十年没挪窝。他们那个铸

我们那个班的聚会堪称经典，除了有人遇到特殊的喜庆之事请客之外，每次都是打平伙，或者说AA制。如意者从不咋呼，不如意的也不自卑，大庆的穿针引线功不可没。从加拿大回来的俞盛条件不错，凑到一起时往往悄无声地带上几瓶好酒，这个不算在份子钱内，但是他从来不显摆。不似社会上有些聚会，完全搞成了得意者展样的舞台，弄得很多人不舒服。

后来不知哪年，胡岱胜把我也拉进去了，我就成了他们中间唯一的老师。我要随份子，他们不同意，没办法每次只得拎几瓶酒参加，权抵餐费。

大庆于7月16日，农历乙巳年六月二十二，时值“小暑”。其实这样说也不准确，他是扑倒在客厅故去的，心源性猝死。当时家中无人，隔日才发现，确切的去世时间说不清楚。

7月18日，市区的同学去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。大家不让我去，说白发人

送黑发人有些忌讳，我还是坚持去了。殡仪馆修建没有几年，宽敞轩亮，包裹在绿意汹涌的山野里。四周很静，只有风拂过草叶的叹息。夏日的阳光过于慷慨，灼烧着同学们有些红肿的眼睛。

告别仪式上，大庆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，穿透云霄，表达了人间至痛，呼唤着对生命消逝最无望的挽留。

仪式结束，大庆的女婿要请大家吃饭答谢一下。我说虽有红白喜事之说，但以大庆五十几岁的年纪，不属喜丧之列，还是算了吧！此番我请了次客，招呼有空的学生，到别处凑了凑。

夏风依然温柔吹拂，另一位学生曲宏杰开车拉着我，顺路去了从来也没去过的大卖场逛了逛。我觉得时间略显紧张，他坚持说转一圈就行。后来我才得知，把故人送往清冷之地后，要到人多热闹的地方转一下，这是民俗，他们还真是讲究。